

南京天禧寺的沿革

夏维中 杨新华 胡正宁

内容提要 近年来,南京文物部门一直在明代大报恩寺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并意外发现北宋初年瘞葬的长干寺(天禧寺)舍利塔地宫,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本文拟在明代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和近人张惠衣先生《金陵大报恩寺塔志》的基础上,以文献材料为主,对天禧寺的渊源长干寺,以及该寺在宋元、明初的基本情况进行一番梳理,并作一些必要的考述。

关键词 长干寺 天禧寺 大报恩寺

夏维中,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210093
杨新华,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 210018
胡正宁,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210093

一、天禧寺的前身长干寺(阿育王寺)的沿革

位于南京城南长干里的天禧寺,其前身应该是六朝时期的长干寺。这一地区的城市布局,在唐末、五代时期曾发生比较大的变动。

六朝时代的建康都城,位于秦淮河(即今天俗称的内秦淮河)之北。当时都城之南的秦淮河两岸,有两个很著名的地区,即“横塘”和“长干”^[1]。“横塘”和“长干”地区,不仅是当时最为繁华的商业区和居民区,同时也是佛寺最为发达的地区。南京地区最早的佛寺建初寺及稍后的长干寺,就坐落在这一地区。

目前有关长干寺的基本史料,是《梁书》卷五四《诸夷·扶南国》中的相关记载。这一史料,也被稍后的《南史》卷七八所录用。另有梁释慧皎《高僧传·晋

并州竺慧达传》也记载了刘萨何的事迹,可作补充。长期以来,之所以一直有人把大报恩寺的前身即天禧寺的源头认作是建初寺,主要是因为他们有意或无意混淆了相关史料中的记载。其实,根据上述长干寺的三种史料,我们就可以清楚地把六朝时期该寺的沿革排列出来。在南朝萧梁时期,梁武帝改造阿育王佛塔,获得舍利及佛爪发,并因此大兴土木,修建双塔,扩建寺庙,长干寺的发展达到了顶峰。除上述三种史料外,唐初释道宣在唐麟德元年(664)所撰的《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对长干寺历史的追述,也是重要的相关史料^[2]。

长干寺废弃的具体时间,以前也一直无法确认。宋元时期的材料,大致认为长干寺的废弃时间是在唐末或南唐。如景定《建康志》就载其“废寺为营庐”^[3]

的时间是在南唐。

其实,长干寺的废弃,时间要早得多。根据唐初释道宣的记载,长干寺早在隋代就已废弃,其舍利等圣物被移奉长安日严寺。不过,他同时也指出,这次移奉或许是出了差错,长干寺的舍利等圣物并没有被移奉到日严寺,而是可能仍留在了南京。前引其《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就对此作了详细记载:

东晋金陵长干塔者,今在润州江宁县故扬都朱雀门东南古越城东废长干寺内……今润州江宁故地,但有砖基三层并刹佛殿,余则榛木荒丛,非人所涉,示是古墓而已。频有大虫,发塔基者多自死。而草深人希,惟有恶兽於中孕育,或衔鹿而血污塔者,寻被打扑,号叫惊人。今去永安坊张侯桥南一里。

余本住京师曲池日严寺,寺即隋炀所造。昔在晋蕃作镇淮河,京寺有塔未安舍利,乃发长干寺塔下,取之入京,埋於日严塔下,施铭於上。于时江南大德五十余人咸言,京师塔下舍利非育王者,育王者乃长干本寺,而不测其是非也。至武德七年日严寺废,僧徒散配,房宇官收,惟舍利塔无人守护。寺墟属官,事须移徙。余师徒十人配住崇义,乃发掘塔下,得舍利三枚,白色光明,大如黍米,并爪一枚,少有黄色,并白发数十余,有杂宝琉璃古器等,总以大铜函盛之。检无螺发。又疑爪黄而小如人者,寻佛倍人爪,赤铜色,今则不尔。乃将至崇义寺佛堂西南塔下,依旧以大石函盛之,本铭覆上,埋于地府。余问隋初南僧,咸曰:爪发梁武帝者,舍利则有疑焉。埋之本铭置于其上。据事以量,则长干佛骨颇移於帝里,然江南古塔犹有神异,崇义所流,盖蔑如也,故两述之矣。但年岁绵远,後人莫测,略编斯纪以显厥缘云。^[4]

由此可见,释道宣当时所在的日严寺瘞藏的舍利,是即位前的隋炀帝在镇守江淮时从南京长干寺移奉过去的。武德七年(624)日严寺废弃,道宣发掘舍利塔基,得舍利三枚、爪一枚及白发数十,并移奉至崇义寺。不过,道宣此前也曾听过不少江南高僧对此众口一词,予以否定,在亲眼所见后更起怀疑,无法断定舍利圣物的移奉是否确实,只得采取了两说并存的态度。

1960年江苏镇江市甘露寺铁塔的考古发掘,也

证实释道宣之疑问。1960年的抢救性发掘,从塔基中清理出舍利等珍贵文物。在盛装舍利的石椁上,铭刻着《重瘞长干寺阿育王塔舍利记》,为唐代润州刺史李德裕于长庆四年(824)所撰。铭文中明确记载:“上元县长干寺阿育王塔舍利二十一粒,缘寺久已荒废,以长庆甲辰岁十一月甲子移置建初寺,分十一粒置北固山,依长干旧制造石塔,永护城镇,与此山俱。”^[5]这一记载,至少提供了三个信息:一是有关六朝长干寺舍利的记载,得到了证实。更重要的是,甘露寺供奉舍利的形制,是参照了长干寺旧制,因此可以从中了解长干寺舍利供奉的情形。二是长干寺的舍利圣物,并没有在隋初被移奉到长安日严寺(至少是一部分)。三是长干寺阿育王塔出土的舍利,一部分被移置南京的建初寺供奉。

二、北宋初期长干寺(天禧寺)的恢复

北宋初年,长干寺在多方人士的努力下得以重建。重建的主要理由,仍是感应舍利。据文献记载,在宋真宗大中祥符(1008-1016)年间,僧可政(演化大师)把长干寺旧址屡显舍利感应之事上报了朝廷,并最终使寺庙在原址得以恢复,宝塔也得以重建,更获得了“圣感舍利宝塔”的赐号。到天禧(1017-1021)年间,长干寺又改称天禧寺。

现存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也是时代较早的文献材料,是政和六年(1116)李之仪所作的《天禧寺新建法堂记》。该文对大中祥符年间天禧寺重建的过程,作了比较明确的记载:

江宁府天禧寺及长干道场,旧葬释迦真身舍利。后寺废。至南唐时为营、庐舍杂比,汗秽蹂践,无复伽蓝绪余。国初,营废,鞠为榛莽。久之,舍利数表见感应。祥符中,僧可政状其迹并感应舍利投进,有诏复为寺。政即其表见之地建塔,赐号圣感舍利宝塔。至天禧中,又赐今额。^[6]

李之仪在撰写此文时,详细记述可政重修舍利塔的《塔记》应该仍存于世^[7],所以对其的记述相对简略。不过,其后的相关文献,其编撰者可能已无缘参考《塔记》,因此大都只能沿袭李之仪此文,一笔带过。其中有关僧可政的文献记载,更是相当缺乏。不过,我们仍可根据文献中的零星记载,大致排列出僧可政在江南的活动轨迹:太宗端拱元年(988),从长安终南山移奉玄奘大师顶骨舍利至长干寺,并在仁

宗天圣五年(1027)建塔供奉(详后);真宗景德(1004-1007)年间,复建了扬州西北五里蜀冈上的大名寺塔^[8];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恢复了长干寺,天圣五年在唐文遇的资助下开凿了天禧寺义井。从可能把长干寺感应舍利之事呈到朝廷并获准建寺,以及当时的权臣李迪为他撰写《义井记》^[9]等情形来看,可政与当时的朝廷高层可能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另外,从上文“僧可政状其迹并感应舍利投进”一语也可推测,可政在恢复长干寺前,极有可能已经得到了前述李德裕移奉到建初寺的感应舍利。

北宋人对天禧寺恢复的情形应该还是比较清楚的。如黄履(安中)在《二十七日登长干塔一首》^[10]一诗中,除详细回顾长干寺的历史外,还非常准确地指出了该寺舍利塔的修建时间:

祥符庚戌感光瑞,累岁九成凌紫霄。

迄今八十有二载,香火瞻奉倾墙髻。

诗中明确提到修塔的起始时间,是“祥符庚戌”年即大中祥符三年(1010),前后费时数年,距黄履登塔已有 82 年。北宋人也知晓天禧寺舍利之事,贺铸《题金陵长干寺塔庚午(1091)十二月赋》^[11]诗云:

南国长干古佛祠,浮图鸳瓦碧参差。

欲追三阁登高作,非复六朝全盛时。

簷角西风挂星斗,牆阴寒雨啸狐狸。

劫灰终换人间世,石罍金棺好护持。

最近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出土的宋初长干寺宝塔地宫石函铭文《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更是提供了宋初恢复长干寺的重要信息。从目前南京市博物馆公布的相关内容来看,尽管碑文漫无缺字,但仍可确定该铭文作者是当时金陵能仁寺的住持圆觉律师德明^[12]。铭文至少提供了以下重要信息:一是可政的正式名号为“讲律演化大师”(文献称“塔主大律师”),其早期的活动应该是在今山西、陕西一带;二是可政建塔的准确时间为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三是舍利塔捐资者和修建者详细名单;四是明确提及可政此举得到了朝中权贵的支持,即文中之“言告中贵,以事闻天,寻奉纶言,赐崇寺塔”;五是再次证实了舍利圣物的存在,具体为“感应舍利十颗,并佛顶骨,洎诸圣舍利,内用金棺,周以银椁,并七宝造阿育王塔,以铁函安置”。出土文物也证实了此点。

修成后的舍利塔,已成标志性建筑,故前引黄履诗中就有“龙蟠虎踞争岷峽,长干窳堵当中标”之句。

郭祥正《奉和安中尚书同漕宪登长干塔》^[13]一诗中也有“揽衣登塔窥沆寥,黄金篆牌神所标。层梯转道二千赤,铃索交响风常飘”之描写。苏颂《次韵和丘秘校登长干寺塔》^[14]一诗对此的描写最为逼真,可资参考。

三、北宋后期天禧寺的改建

北宋后期,天禧寺进行了新一轮的大规模建设,基本确定了后来的布局。哲宗元符年间(1098-1100),该寺首先为正风水而对地形进行了改造。

原来,北宋前期可政恢复长干寺时,这一地区的环境,已与六朝、隋唐时期明显不同。南京城区在晚唐杨吴及南唐时期的南扩,将原为六朝都城南护城河的秦淮河圈于城中,同时又在新的南城墙外开挖了护城河(即今天中华门外的护城河,俗称为外秦淮河)。这一变化,使被圈在城外的长干寺遗址,因北面紧贴着护城河,南面又受制于雨花台丘陵,显得十分局促。同时,其东西向的纵深也严重不足。

这一地形,大大限制了宋初长干寺(天禧寺)的布局。长干寺(天禧寺)不仅无法按传统的南北向进行布局,而只能坐东向西。更严重的是,由于纵深不足,寺庙的东西布局也无法充分展开,佛塔之后(即东面)再无可用之地,可政不得已而只能把本应建在佛塔之后的院落移到寺之北侧(即护城河南侧),与风水要求的严重不符。元符年间,这一不足在新任住持永公(慧严)的努力下得以逐步改观。《天禧寺新建法堂记》一文,记载了相关的事迹:

寺拘山水形势。坐乙向辛,以越王台为案。塔之后,地势倾下。政失于迁就,不能培筑相因,始以北廊造院,为安僧之地。虽规模仅足,而狭陋劣能庇风雨。事既不正,位亦不安,以故事不复立振。元符二年,知府事温陵吕公升卿曰:“是一大丛林,特主之未得其人耳”。遂请于朝廷,改十方住持。既报可,即迎致大导师永公为初祖。永法云圆通禅师高弟,缘契都城,大作佛事,名震四方,朝廷赐方袍,加号慧严。受请入寺,顾瞻太息曰:“真福地也。所以不振者,正坐不正耳。”乃于塔后增筑高垣,坛址层叠,凡下而上,积二丈三尺,深入四十尺,横亘二十丈。^[15]

天禧寺的改建,得益于该寺住持制度的改革。宋代寺院的住持制度,一般可分为十方住持制和甲乙徒弟制两种。前者延请诸方名德以任住持,后者的住

持则为同寺师徒相授。天禧寺在元符二年(1099)经知府吕升卿提请而改为十方寺,此前实行的应是甲乙徒弟制。住持制度的改革,使永公(慧严)这样的高僧(东京法云寺法秀圆通禅师^[16]的高弟)得以入住天禧寺,并很快通过在宝塔后面(即东面)堆土的方法,来扩展地基,改造地形。到徽宗政和二年(1112),他又利用新堆的塔后地基,在南昌魏德宝夫妻的捐助下,兴修了法堂等重要建筑,并添置了寺田。李之仪作为“余从慧严游久矣,又始终亲睹其事”的见证人,对此作了详细记载:

将起法堂,次第以正其位。已而,信士南昌魏德宝同其妻王氏见而喜曰:“如此更易,方见形胜。”慧严因道历其详,而德宝顾其妻曰:“此地不植福,更将何之?”独许作堂,且曰:“不计其资,惟成是务。”慧严即鸠材庀工,未几,堂成,高明静深,万象俱发,宏丽雄特,为一方丛林之冠。俯视畴昔,无异发覆破阁,如出云霄之外。凡甍檐髹绘,总用钱五百万。慧严又建寝堂、方丈,尽所增之胜,资藉缔构。又建僧堂、厨库,移经藏于故院,随向展衍,各适其正,焕然一新,直一大丛林矣。异时,德宝再至,踴躍称赞曰:“非师正眼炤辙,道力超异,则不能有举。非我信闻经始,则众缘何从而应!”遂请僧众转大藏经,修水陆斋,落成其事。又曰:“丛林既新,将不下五、六万众,其将何以备斋粥?”慧严曰:“子于此地信有缘,而我与子殆非今日相遇者。倘如斋粥必继,则功德圆满,亦在子耳。”德宝曰:“请为师买田产,买芦场,收其所入以继之。”慧严曰:“子果有是愿,我将为子记之,以信不朽。”乃遣其徒道之走太平,属余为之记。余从慧严游久矣,又始终亲睹其事,当抑扬表发,以侈其甚盛之举。而余老且病,文思衰耗,故直书以报之。自余兴废本末,则有塔记存焉。兹得以略。政和六年九月十五日赵郡李之仪记。^[17]

四、元代的天禧寺

元代的天禧寺,仍然拥有崇高的地位。元初佛光大师开讲天禧寺,获得寺产及“元兴天禧慈恩旌忠教寺额”。元文宗登基后,对天禧寺关爱有加。张铉《至正金陵新志》曾对元初天禧寺的情形作过大致描述:

至元二十五年,有诏选高行僧三十员,开讲

于江南诸郡,择名刹以居之。时槁城德公讲主,首奉诏开席于金陵天禧寺,说经训徒,传慈恩之教。未几,特赐号佛光大师,并拨赐故宋太师秦申王坟寺旌忠寺为下院,以其废产,共贍讲席。改赐元兴天禧慈恩旌忠教寺额。僧统广福大师尝施财缮修大塔。^[18]

关于佛光大师的生平及其在天禧寺的情形,文献有更为详细的记载:

释志德,号云岩,山东东昌淄氏子也。十二受经于顺德开元寺海闻和尚,闻真定法照禧法师大弘慈恩宗旨于龙兴寺,径从之学而尽其蕴。至元二十五年,诏江淮诸路立御讲三十六所,务求其宗正行修者分主之。德被选,世祖召见,赐宴并紫方袍,命主天禧、旌忠二刹,日讲《法华》、《华严》、《金刚》、《唯识》等疏。三十一年,特赐佛光大师之号。每与七众授戒,必令其父母兄弟相教无犯,至于然香然顶指为终身誓。居久,尽出衣钵,新其殿庑、楼阁。或岁俭,乃煮糜食饿殍数万人。建康流俗尚醪醴,好结官吏,德独以律绳自,徒众谨饰出止,若互用常住物者,误一罚百,故犯者摈之。居天禧三十余年,一衲一履,终身不易,午过不食,夜则危坐达旦,以苦诵丧明。忽梦梵僧迎居内院高座,空中散花如雨,因示微疾,至治二年二月七日犹诵经不辍,顷之辞众安坐而化,世寿八十八。龁留二十一日,颜貌红润如生,阖维舍利无算,会者数万人。塔江宁张家山,学士赵孟頫为铭^[19]

元初选高僧开讲江南名刹,天禧寺能被选为讲所之一,由此也可见其当时所拥有的声誉。而佛光大师30余年的惨淡经营,则更进一步巩固甚至提高了天禧寺的地位。至元二十五年(1288)或稍前(一说为至元二十年),志德奉旨入讲天禧寺,到至元三十一年(1294)即获“佛光大师”赐号,并得到旌忠寺田产,天禧寺也获得“元兴天禧慈恩旌忠教寺”赐额。此后,佛光大师长期主持天禧寺,到英宗至治二年(1322)二月坐化,享年88岁。其塔铭由赵孟頫书写,可见佛光大师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不久,天禧寺又迎来了另一个发展机遇,那就是与其有较深渊源的元文宗的资助。至正《金陵新志》对此也做了简略的记录:

泰定中,潜龙时尝数幸寺,及登大统,以所

奉观音像付寺供养,岁给香灯之费。至顺初,佛光之孙法嵩入觐。上顾谓曰:舍利塔曾修完否?嵩曰:未也。即日赐内金三定,及官钱五千缗,以助缮修。台城郡守咸致其力。有旨命佛光之徒广演主寺事,赐号弘教大师。塔完之日,尝感天花如雨,祥光如练满空者,凡数日。详见中丞赵世延所撰碑。^[20]

这段记载,大致是依据元代名臣赵世延为此所撰的碑记。赵世延在英宗至治(1321-1322)年间曾任江南行台(治所集庆,今南京)御史中丞,元泰定帝泰定(1323-1328)年间入朝复为御史中丞,随后相继任中书右丞、翰林学士承旨、光禄大夫、同知枢密院事等职,文宗时(1328至1332年在位,年号天历、至顺)更是加授集贤大学士、奎章阁大学士、中书平章政事等职,编修《经世大典》,地位显赫^[21]。赵世延之所以能为天禧寺撰写碑记,固然与他在南京的任职经历有关,但更重要的应该是与文宗有关。文宗为武宗次子,早年因宫廷斗争,曾被外放。泰定二年(1325)正月,文宗以怀王的身分被命出居南京,直到致和元年(1328)三月才被迁居江陵^[22]。在南京期间,文王曾数次到过天禧寺,上文中“泰定中,潜龙时尝数幸寺”一语即指此事。登基后,文宗非常关心天禧寺舍利塔的维修,不仅通过赏赐的方式为天禧寺筹措资金,而且直接出面任命佛光之徒广演为天禧寺主持。文宗此举属特事特办,有违常规,因为天禧寺为十方寺,其住持必须由地方长官参考相关公举意见而作延请,并上报朝廷批准。文宗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就在于他早在南京时就结识了这位天禧寺的高僧,并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亲历此事的释大诩曾在事后追述过此事:

弘教大师演公道源,奉旨主金陵天禧寺,缮修大完,又葺其受经真如院,作法堂、门庑、庖廩,咸极新好,至是列其实求书之。至顺间,天禧寺前主僧卒于都,执事请之朝择继者,难其人,又有制:凡在外有奏旨非由县州审实上之行省咨入,则毋以闻。时予与钟山昙芳,蒙召留京,文皇顾谓曰:昔幸天禧,见僧广演有高行,汝可举于宣政院使奏,特降玺书褒护,勿拘常制。道源自居十年克弘其教,才智识量有大过人者,无贱贵咸器服之。^[23]

元代天禧寺在经籍方面也有贡献。尽管史料缺

失,但我们仍能发现一些残缺的记载。如该寺讲主法嵩曾刊印过《五十三佛名经》,释大诩曾为之作序:“金陵法嵩讲主,博通经论,尝谓修行捷径,无踰念佛。乃考经援义,本其行愿,取五十三佛与五十三佛名印施劝诵,其训迪有方矣。”^[24]

五、明初的重修及再次毁损

天禧寺经受元末战火,损失严重,但其舍利塔塔身主体却得以幸存。新朝对天禧寺这样一座拥有悠久历史和崇高地位的名刹,其态度前后曾发生过明显的变化。明太祖朱元璋起初对此并不满意,一度曾打算移址重建,但后来却又在黄立恭的劝说下允许重建。建文帝时期,天禧寺成为汉文大藏经的刻印和流通中心。永乐初期,明成祖朱棣也对天禧寺高度重视,并在其遭受火灾后不久,很快就决定以前所未有的高规格予以重修,经数十年的努力,最终修成了举世闻名的大报恩寺及其琉璃塔。

朱元璋对天禧寺的不满意,主要是其舍利塔的高度和方位。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一案案发,朱元璋竟归咎于此塔破坏了南京的风水,并下令拆除移建到钟山,后因施工中出了人命才作罢。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底亲自撰写的《御制黄侍郎立恭完塔记》^[25]长文,对此进行了追述:

京南关左厢朱雀桥之左有浮屠,层高九级,根入厚坤……洪武十三年,胡、陈乱政,朕观七朝居是土者,皆臣愚君者多矣。考山川之形势,大江西来,淮山弼之。山庞川巨,右势足矣。以此观之,龙虎均停。择帝居者,宜其然也,何故臣下之不臣,无乃虎方坤位,浮图太耸之故。于是,命构架,将移塔于钟山之左。工将完,塔将毁,有来告者:“工人有坠于塔下者绝”,于是罢役。

不过,朱元璋在时任鞍辔局大使黄立恭^[26]的影响下,很快就改变了态度。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同意重修天禧寺塔。此后,黄立恭利用三年的时间,依靠民间捐助筹集巨额经费^[27],不仅修缮了舍利塔,而且还重修了大殿等建筑。朱元璋对此非常满意,不仅重新恢复了该寺的建制,亲自指定僧录司右讲经守仁为该寺住持,而且还在半年后亲至该寺举行盛大的佛事。上引《御制黄侍郎立恭完塔记》也详细介绍了有关情况:

未几,今工部左侍郎黄立恭稽首顿首再拜,

入奏,其辞曰:“臣立恭寓于世而无益于世,群于人而无善于人。生无名于宇宙之间,死不能同聪明之神游于上下。臣切慕之,故思欲有为,未知可否?”朕谓曰:“丈夫天地间,五欲不生,十恶不作,何为而不可也哉。”对曰:“臣见南关有如来真身舍利之塔,经兵被火,周回栏楯,并九层图画仙灵,俱各颓坏,欲完之,特请旨以施为。”朕许之。立恭再拜而退,诣所在,经方定向,若山则则高益下损,故基则增微壮广,施财劬工以营缮。京之军民,闻立恭作佛之善事,有施财以阿之者,有诚然为生死而布德者。一时从者,如流之趋下。诸费折黄金两万五千两。三年而来,告塔已完矣。大雄之殿,僧房两庑,重门楼观,亦皆备矣。群僧会集,有僧录司右讲经守仁者,书通东鲁,经备西来,于是命住持是寺。仍敕礼部并光禄寺饌素羞,以饭诸人。时机冗未暇亲至,逾半载,敕礼部曹召僧录司首官左善世弘道、右善世夷简等五人。朕谓曰:“塔完寺备,数年以来,征讨弗停,阵歿军将,欲报其忠,仗佛愿力,作大善事。”期日,朕至,仰视则塔穿鸟道,平视则殿宇巍然,俯看绮砌无不精专。游目塔殿所在,金碧瑩煌……

根据上文,我们大致可以推定,这次工程的完工时间是在洪武二十一年的六月份左右。其它的材料也可对此作些补充。如卒于建文朝的唐之淳,在洪武二十年(1387)时九月曾去天禧寺观看卢月桐作画,返回后作《天禧寺》^[28]诗两首:

秋路沙晴不起风,长干寺里访卢鸿。
瓦棺已失维摩样,画壁他年看月桐。

月桐不似虎头痴,颇学王维爱作诗。
烦君满壁沧洲画,画我萍居听雨诗。

另有胡奎《游天禧寺》^[29]诗,也当作于天禧寺完工之后。该诗对新修的天禧寺作了如下描述:

梵王宫在帝城南,一锡秋飞入翠岚。
出寺已过潮十八,到京还近月初三。
祇园地布金沙满,香积厨分玉露甘。
若见黄花潭般若,凭归传语老瞿昙。

复建后的天禧寺,获得了崇高的地位,成为南京当时的三大刹之一。不久,天禧寺又获得了一次新的发展机遇,那就是官版汉文刻本大藏经《初刻南藏》^[30]

的刻印和流通。以往长期被误认为刻于洪武年间的《洪武南藏》,实际上完成于建文朝,因此何梅教授改称其为《初刻南藏》。《初刻南藏》的雕印,是在礼部僧录司领导下进行的。僧录司原设在天界寺,洪武二十一年因该寺火灾而迁到天禧寺。由于史料的缺失,尽管现在还不能确定《初刻南藏》的经版雕刻地点是否就是天禧寺,但经版的存放地点肯定是在天禧寺,证据是《金陵梵刹志》中有关永乐元年(1403)请经付费的记载:

永乐元年九月二十九日午时,本司官左善世道衍一同工部侍郎金忠、锦衣卫指挥赵曦于武英殿题奏:“天禧寺藏经版,有人来印的,合无要他出些施利?”奉圣旨:“问他取些个。钦此”。^[31]

正是天禧寺地位的重新确立,才使朱棣在登基以后对此予以高度重视。溥洽是这一时期重要的相关人物。溥洽,字南洲,晚号迂叟,又称一雨翁,俗姓陆氏,为明初著名高僧。大约在天禧寺重修之后,溥洽被朱元璋召至南京任僧录司右讲经,居长干(即天禧寺)西丈室三年,后又任天禧寺住持。三年之后,升左善世。朱棣靖难之后,道衍因功任左善世而溥洽逊任右善世。永乐三年(1405)至四年(1405)间,朱棣曾下令修缮天禧寺浮图,完工后命溥洽庆赞,为一时盛典,所谓“落成之日,车驾临幸,命师庆赞。祥光烨煜,万众聚观,天颜愉悻。”^[32]

永乐五年(1407)仁孝皇后去世后,朱棣曾下令在天禧寺举行盛大法会。此年的十月,朱棣还亲自撰写了《报恩寺修官斋敕》(当时该寺仍应称天禧寺),记述了这一盛典^[33]。

不久之后,天禧寺被人纵火而毁,而朱棣很快就决定复建。在永乐十一年(1413),朱棣在《重修报恩寺敕》中详细叙说了原委:

天禧寺旧名长干寺,建于吴赤乌年间。缘及历代,屡兴屡废。宋真宗天禧年间,尝经修建,遂改名天禧寺。至我朝洪武年间,寺宇稍坏。工部侍郎黄立恭奏请募众财,略为修葺。朕即位之初,遂敕工部修理,比旧加新。比年有无籍僧本性,以其私愤,怀杀人之心,潜于僧室放火,将寺焚毁。崇殿修廊,寸木不存,黄金之地,悉为瓦砾。浮屠煨烬,颓裂倾敝。周览顾望,丘墟草野。朕念皇考、皇妣罔极之恩无以报称,况此灵迹岂可终废?乃用军民人等勤劳其力,趋事付工者如

水之流下,其势莫御。一新创建,充广殿宇,重作浮屠。比之于旧,工力万倍。以此胜因,上荐父皇、母后在天之灵,下为天下生民祈福,使雨暘时若,百谷丰登,家给人足,妖孽不兴,灾沴不作,乃名曰大报恩寺。表兹胜刹,垂耀无穷。告于有众,咸使知之。^[34]

六、玄奘大师灵骨的供奉

宋代以来,天禧寺还一直供奉着另一佛教圣物,即玄奘大师的顶骨。早在端拱元年(988),可政就把玄奘法师头骨从陕西长安终南山紫阁寺请回到长干寺供奉。当初的供奉,应该有碑刻留世^[35]。对此,南宋《景定建康志》作了明确的记载:

白塔在寺东,即葬唐三藏大徧觉玄奘大法师顶骨之所,金陵僧可政端拱元年得于长安终南山紫阁寺。^[36]

元至正《金陵新志》亦承袭此说:

白塔在寺东,即葬唐三藏大徧觉玄奘法师顶骨所。金陵僧可政端拱元年,得于长安终南山紫阁寺。^[37]

不过,到明代就有人开始怀疑。顾起元《客座赘语》云:

余尝至大报恩寺登三藏殿后阶,有小塔,云是唐玄奘葬处……乃考晋隆安中,延致鸠摩罗什施寺赐额法王,尊为三藏国师。寺名白塔,后并入报恩。疑此是三藏旧塔院,误认为唐之玄奘耳。^[38]

这种怀疑,一直延续到了 20 世纪。不过,20 世纪 40 年代对塔基遗址的发掘,证实了历史文献的真实性。1942 年冬,日本学者谷田阅次受驻扎在南京中华门外大报恩寺遗址的侵华日军高森部队之邀,发掘三藏塔基,最终使玄奘法师顶骨重见天日^[39]。此次发掘,同时出土了一些带有铭文的文物,为我们了解玄奘法师顶骨的历代供奉提供了重要信息。如一件用砖作盖的石函,其两侧就刻有文字,其中一面之刻文如下:

大唐三藏大徧觉法师玄奘顶骨早因黄巢发掘今长干演化大师可政于长安传得于此葬之天圣丁卯二月五日同缘弟子唐文遇弟文德文庆弟子丁洪审弟子刘文进弟子张霭

该铭文明确记载了唐三藏法师塔毁于黄巢之乱,其顶骨由长干演化大师可政从长安请回金陵。这

一记载,与方志记载完全一致。但刻文还提供了建塔供奉灵骨的具体年代,即天圣丁卯年(天圣五年,1027),此时已距端拱元年(988)演化大师可政赴西安之时近 40 年。铭文中所提到的唐文遇,也见于方志记载^[40]。

石函另一面刻文,也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具体如下:

玄奘法师顶骨塔初在天禧
寺之东冈
大明洪武十九年受菩萨戒
弟子黄福灯
普宝迁于寺之南冈三塔
之上是岁丙寅冬十月传教比丘守仁谨志”

这一刻文,表明三藏塔原在天禧寺东冈,洪武十九年(1386)迁到南冈。此次搬迁,应与当时黄立恭主持的天禧寺的重修有关,文中的“受菩萨戒弟子黄福灯”极有可能就是黄立恭。

在出土的银质小箱上,刻有“大元至顺三年壬月申四吉日天禧住持弘教大师演吉祥置”之铭文。这一铭文说明,前文提及的天禧寺住持弘教大师广演,在文宗至顺三年(1332)曾经打开过灵塔,供奉过灵骨。这次供奉,应与当时该寺重修舍利塔有关。

注释

[1]“横塘”,即与当时长江堤岸垂直的秦淮河河岸,引申为秦淮河两岸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水西门到中华门的秦淮河两岸。当时,因长江水道尚未西移,这里仍紧贴秦淮河的入江口,为水运枢纽。而“长干”的范围,大致包括秦淮河南岸到今雨花台一带的地区。“干”是江东方言对山冈间平地的称谓。

[2][唐]释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一,金陵刻经处 1922 年刊本。

[3][宋]周应和:《景定建康志》卷四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89 册,第 590 页。

[4][唐]释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一,金陵刻经处 1922 年刊本。

[5]江苏省文物工作队镇江分队、镇江博物馆:《江苏镇江甘露寺铁塔塔基发掘记》,《考古》1961 年第 6 期。

[6][宋]李之仪:《姑溪居士前集》卷三七《天禧寺新建法堂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20 册,第 56 页。

[7]该文未有“自余兴废本末,则有塔记存焉,兹得以略”一句,可以证明。

[8][清]王定安:《重修两淮盐法志》卷一五零《杂记门》,续修四库全书第 845 册,第 592 页。

[9][宋]周应和：《景定建康志》卷一九“义井”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9册，第94-95页。

[10][清]严观：《江宁金石记》卷八《诗词》，续修四库全书第910册，第308页。

[11][宋]贺铸：《庆湖遗老诗集》卷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3册，第259页。

[12]有关德明的事迹，仅见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一七《明律篇第四·宋柳律师圆觉律师传》。具体如下：“圆觉律师德明者，住金陵能仁寺。际遇太宗召见，赐紫衣并御容及罗汉像以归。律声振江以南，求法人望之而归。真宗嗣位，复赠以诗章，有‘精勤演律达真风，释子南禅道少同’之句。二师道行（引注：另一人为四川开县大觉寺柳律师）。在当时必表表一方，竟尔失传，仅于断镌残刻间得其名，不得言其详也。惜哉！”（续修四库全书第1283册，第253页。）

[13]郭祥正：《青山集》卷一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6册，第647页。

[14]苏颂：《苏魏公文集》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2册，第161页。

[15][宋]李之仪：《姑溪居士前集》卷三七《天禧寺新建法堂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0册，第569页。

[16][宋]惠洪：《禅林僧宝传》卷二六《法云圆通秀禅师》，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52册。

[17][宋]李之仪：《姑溪居士前集》卷三七《天禧寺新建法堂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0册，第569-570页。

[18][元]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卷一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2册，第424页。

[19][明]释如惺：《大明高僧传》卷二《金陵天禧寺沙门释志德传十二（海闻法照禧）》，续修四库全书第1285册，第221页。

[20][元]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卷一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2册，第424页。

[21][元史]卷一百八十《列传》第六十七，中华书局1976年版。

[22][元史]卷三二《本纪》三二《文宗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

[23][元]释大诰：《蒲室集》卷一一《集庆路真如院碑铭有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4册，第603页。

[24][元]释大诰：《蒲室集》卷七《天禧寺嵩讲主刊施五十三佛名经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4册，第562页。

[25][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三一《御制黄侍郎立恭完塔记》，续修四库全书第718册，第673-674页。

[26]从朱元璋的记述及其他零星材料来看，黄立恭应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并深得朱元璋的信任。《御制黄侍郎立恭完塔记》中提到了黄立恭的工匠身世和佛教信仰：“其黄立恭昔本技艺，所得者甚微。然而设心为善，夫妇异处三十余年，朝出暮归，其妻送迎若宾礼焉，未尝有间。以一夫之智，赤手成此善事，是其美也。然而事成则成矣，又其妻与内者尽皆为尼。呜呼！立恭之诚，岂止外成于塔寺，于家化及闺门，然一家修善，处于是方，将必成

矣。”据《补续高僧传》卷十五《般若法秀禅师》记载，洪武二十年工部右侍郎黄立恭受朱元璋之命，推选僧绍义重建江宁天王山般若禅院（般若寺），其信任由此可见。

[27]朱元璋在《御制黄侍郎立恭完塔记》中对此高度评价：“立恭职工部，掌诸名材、诸匠属焉，一一皆佣其工，未上烦于朕，下挟于工者。其佣工之资，皆厚之，世人有所不及。设若立恭操愚夫之智，日侍左右，言颇信行，倘有所需，安不有微助，今绝然无需。”

[28][明]唐之淳：《唐愚士诗》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6册，第583页。诗人自注“九月十一日天禧寺访卢月桐观画壁回，口占二绝句以寄”，说明当时天禧寺正在绘制大殿等处壁画。

[29][明]胡奎：《斗南老人集》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3册，第444页。胡奎（1335-约1409），字虚白，号斗南老人。海宁人。明初以儒学征，官王府教授。

[30]20世纪30年代，此藏孤本在四川省崇庆县街子乡（今崇州市街子镇）的凤栖山上古寺被发现，当时被著名学者吕澂先生认定为洪武年间的刻本，并命名为《洪武南藏》。20世纪末，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何梅教授考订此藏实际上是刻于建文年间，但由于明成祖的篡改，后人误解其为洪武刻本。何梅根据自己的考证，将其改名为《初刻南藏》。请参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第九章第一节〔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本文的相关论述主要参考了何梅的研究成果。

[31][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续修四库全书第718册，第470页。

[32][明]《补续高僧传》卷二五《杂科篇·南洲溥洽法师传》，续修四库全书第1283册，第328-329页。

[33][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三一《报恩寺修官斋敕》，续修四库全书第718册，第674页。

[34]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三一《重修报恩寺敕》，续修四库全书第718册，第674页。

[35]按清人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九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32册）收录有“天禧寺白塔记”碑名，云：“端拱元年，僧可政得玄奘顶骨于终南山紫阁寺葬于此，起塔。”

[36][宋]周应和：《景定建康志》卷四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9册，第590页。

[37][元]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卷一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2册，第590页。

[38][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五《三藏塔》，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49页。

[39]谷田阅次：《三藏塔建筑遗迹之发掘》，光中法师编著：《唐玄奘三藏传史汇编·附录》，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

[40][宋]周应和：《景定建康志》卷十九“义井”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9册，第94-95页。

〔责任编辑：肖波〕